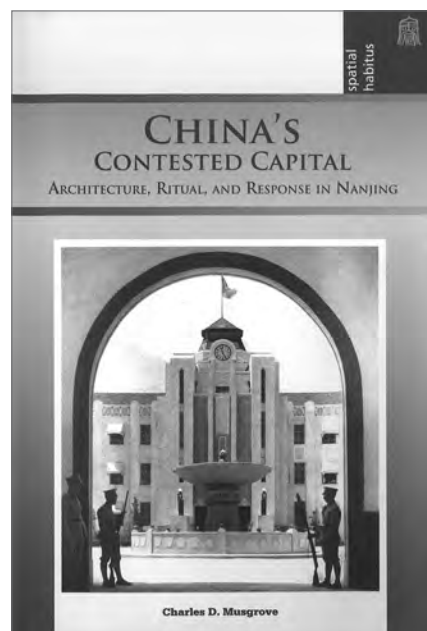


# 首都建設與民族國家建構

## ——評 Charles D. Musgrove,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 Architecture, Ritual, and Response in Nanjing*

• 胡悦晗

抗日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運用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及建築技術，使南京在通訊、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煥然一新，並通過修建集現代化技術與中國傳統美學特點於一身的公共文化建築，彰顯國家權力，向民眾灌輸國家與民族認同，使南京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首都。



Charles D. Musgrove,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 Architecture, Ritual, and Response in Nanj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古代南京都城既被視為富庶、奢靡的逸樂象徵，也被視作國力貧瘠、王朝偏安的軟弱體現。鴉片戰爭以來，隨着沿海開埠口岸的崛起，南京的發展明顯遲滯。1927年後政治中心地位的確立為南京城市建設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從而奠定了其現代城市的發展格局<sup>①</sup>。晚近以來，海內外研究者從市政建設、日常生活、社會空間、符號建構、城市規劃等經濟—社會史及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南京的現代化進程，大大豐富了民國時期南京城市史的研究<sup>②</sup>。

城市研究就其本質而言就是空間研究，空間是城市記憶的重要載體<sup>③</sup>。1927年，當國民黨力排眾議，定都南京時，各派力量均對這個城市能否具備一個現代首都的功能心存疑慮。然而，抗日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運用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及建築技術，不僅使南京在通

訊、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煥然一新，並通過修建集現代化技術與中國傳統美學特點於一身的公共文化建築，彰顯國家權力，向民眾灌輸國家與民族認同，使南京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首都。

1927年國民黨執政至1937年抗戰爆發前，是民國時期一個難得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階段，被稱為「黃金十年」（又稱「南京十年」）。「黃金十年」期間，南京城的蛻變究竟是如何發生，又是如何展開的？國民政府對南京的塑造有哪些值得鑒戒之處？馬里蘭聖瑪麗學院歷史系副教授莫林（Charles D. Musgrove）於2013年出版的《競爭的中國首都：南京的建築、儀式與回應》（*China's Contested Capital: Architecture, Ritual, and Response in Nanjing*，以下簡稱《競爭的中國首都》，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把民國時期的南京城帶回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語境中，聚焦探討它如何從一個地方性政黨派系掌控的城市轉變成為一個民族的整體象徵。本書運用建築學與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將民國時期南京的建築空間作為研究對象，對上述問題加以探究。

全書共有六個章節，大體分為四個主題：南京如何在不斷競爭的過程中脫穎而出成為首都；1929年《首都計劃》的實施及「建築革命」；各種政治儀式與慶典活動的開展；政府對民眾的規訓以及民眾的回應。作者在書末延伸討論，比較1949年後北京、台北和南京三個城市，對民國時期首都建設的歷史經驗和啟示加以概括提煉。基於

此，筆者擬圍繞着上述主題，對本書展開述評。

## 一 南京與民國時期的首都之爭

「首都」並非一個簡單的城市，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是一個具有豐富象徵意義的國家權力中樞<sup>④</sup>。自工業革命以來，新型民族國家的首都通常既是國家政治管理的權力中心，也是民族國家構建與整合的精神象徵。首都作為一個國家政權統治的基礎和國家存在的體現，在二十世紀初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背景下，其城市設計往往被置於一種異乎尋常的突出地位——誰控制了「首都」，就意味着誰佔據了政治道義的制高點，擁有比其他政治強權更多的政治合法性<sup>⑤</sup>。對首都的爭奪、規劃與改造在在成為執政者亟需掌握的政治符號。

作者在書中指出，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有意將南京定為民國首都。在孫中山眼中，北京意味着滿清權貴的腐朽以及封建王朝的暮氣沉沉，而南京不僅具有「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的地理格局與帝王之氣，驅逐蒙元入侵的明太祖也歸葬於此。他多次表示帝制時代的都城北京不宜作為共和國的首都，要將南京打造成為未來中國的首都及精神象徵（頁33-34）。然而，作為首都的候選城市，民國初年的南京依然面臨北京和武漢兩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南京十年」時期南京城的蛻變究竟是如何展開的？《競爭的中國首都》一書把民國時期的南京城帶回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語境中，聚焦探討它如何從一個地方性政黨派系掌控的城市轉變成為一個民族的整體象徵。

在作者看來，南京與北京分別代表着現代中國的不同面向。南京能夠汲取國民黨先驅發源於廣州的民族革命精神，而作為帝都的北京則更容易獲得西方列強的公開支持。國民黨領袖希望通過遷都創造出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

北京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是東西南北聯繫的必經通道<sup>⑥</sup>。那裏既有紫禁城、國子監等最高政治與學術中心，亦有大柵欄、琉璃廠等民間商業與文化區。對廣大民眾而言，北京仍然是國家的政治與文化中心。清末民初，政權易幟。各派勢力此起彼伏，競相佔據京城的政治舞台，卻絲毫不影響北京的首都地位。如作者所言，儘管孫中山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但南方革命黨人旋即遭遇北方軍政勢力的高壓。伴隨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北京再度成為國家政治中心（頁32）。

隨着北伐的興起，國民黨的軍事力量擴張至長江中下游地區，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佔據了九省通衢的武漢，他們宣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已經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妥協，這裏將成為新一輪國民革命高潮的起點。與此同時，國民黨右派挺進長江下游地區，將江浙兩省納入勢力範圍，並醞釀遷都南京。一場「民國永久之首都」的大討論，圍繞着北京、南京、武漢三個城市展開。南北雙方的軍閥、地方實力派及報刊雜誌均認為各自的城市是首都的不二選擇。作者提到，在北京的支持者看來，南京是偏安、文弱、短命、奢靡的王朝的代名詞。此外，南京距離上海這一西方殖民勢力滲透的中心城市太近；而北京則雄踞國疆上游，對建立全國統治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歷史上建都北京的朝代大都國力強盛，國運長久（頁49-50）。

在作者看來，南京與北京分別代表着現代中國的不同面向。南京能夠汲取國民黨先驅發源於廣州的

民族革命精神，而作為帝都的北京則更容易獲得西方列強的公開支持（頁47）。國民黨領袖希望通過遷都創造出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面對爭議，他們抬高孫中山作為黨國象徵的精神地位，將南京與總理遺願聯繫在一起——畢竟孫中山生前希望日後歸葬南京（頁48-49）。在他們看來，北京是封建殘存勢力和軍閥政客的盤踞地，不適合做革命新政府的首都。北方在歷史上多次因遭遇蠻族入侵而淪陷，南京則每每在北方淪陷時期成為漢民族延續的政權核心，保存了民族文化傳統，成為孫中山所指的民族精神象徵所在（頁34-35）。

隨着北伐的軍事勝利，定都南京的呼聲日益高漲，一種樂觀的情緒在民眾中蔓延。各種全國性會議在南京相繼召開，各界人士紛紛聚集南京。這個城市迎來了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經濟的繁榮。北方的銀行、公司相繼南遷，為南京帶來了大量投資。國民政府決心將南京打造成為模範首都，並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象徵。這個首都必須在各方面做到最好，各種軟硬體設施必須是最現代化和高效的，整體環境也必須比其他城市更優勝。南京開始成為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國民政府向世界展示其執政能力的視窗。

## 二 首都設計與「建築革命」

在傳統中國，儒家精英將建築視為器物層面的匠作勞動，既非藝術，亦非科學。伴隨西方列強的入

侵，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現代西式建築開始在開埠口岸大量出現，對傳統中國建築行業構成極大競爭（頁91）。庚款留學孕育出清末民初一批數量巨大的留學生赴美、日、法等國學習土木工程等專業。1920年代末，他們相繼學成歸來，創辦建築師事務所，成為現代中國建築行業的核心力量，在國內逐步確立建築行業規範及其自身群體的社會地位。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以及定都南京，為中國的建築師進行他們的「建築革命」提供了契機（頁93）。

作者認為國民政府對首都南京的規劃和建設極為重視，專門成立了首都建設委員會等相關機構制訂首都發展規劃，希望將南京建成一個中心城市，以區別於象徵着腐朽過去的北京以及象徵着西方列強侵略的租界城市上海（頁89）。1927年，劉紀文出任南京市首任市長。上任伊始，他即任用一批在英美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建築專家，從事城市的規劃與設計工作。由此，一份旨在構建一種有秩序的現代生活，有別於帝國時代骯髒、無序的都市生活的《首都計劃》應運而生（頁79）。這些建築專家開始根據自身對現代中國的理解和想像，將國家、民族等政治理念融入他們設計的建築物中，掀起了一場「建築革命」。

政府制訂的《首都計劃》在規劃、設計、管理等多方面都借鑒了歐美模式，南京開始具有現代都市的道路交通系統、港口作業區、機場、住宅與商業區等多種城市空間。然而，盲目跟隨西方樣式對建

設民族精神是不合適的，國民黨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頁100）。為了使南京超越於西方發達國家的首都，政府提醒規劃者要凸顯中國歷史上繁榮時代的典型特徵，充分借鑒中國傳統建築式樣的優秀特色，突出國家主權與民族文化。政府希望南京既具有現代化特徵，又體現出中華民族精神蘊涵。

政府的理念得到了規劃者的認同，他們將中式建築的文化美感與西式建築的原料和技術方法相結合（頁93）。考試院、交通部等建築外觀採用了中國傳統的宮殿式屋頂及亭閣屋檐的裝飾，並採用了採光充足的大窗戶；法院的建築則完全按照「國際標準」（頁107）。政府希望這種建築形式能夠使西方列強相信中國的執政者忠於堅守法律的國際性與普世標準（頁108）。

1929年，南京市着手規劃中央政治區。作者指出，政府選擇紫金山南麓作為位址，不僅為了「鼎新革故」、「除舊更新」，更具有喚醒民族主義情感以及加強黨國統治的意識形態灌輸功能。對於意在「民族復興」的國民黨政治領袖而言，明朝是一個漢民族正統王朝成功驅逐異族、重建政權的時代；將中央政治區置於紫金山南麓明孝陵附近，凸顯了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思想。孫中山生前希望人們能夠將他作為共和國的領導者而緬懷，期望自己的陵寢成為正在形成中的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就像列寧與拿破崙的墳墓一樣。儘管孫中山以堅韌不屈的革命精神所著稱，但死後歸葬紫金山的遺願表明他希望將其陵

1927年，建築專家開始根據自身對現代中國的理解和想像，將國家、民族等政治理念融入他們設計的建築物中，掀起了一場「建築革命」。政府希望南京既具有現代化特徵，又體現出中華民族精神蘊涵。

1930年代南京的「建築革命」體現出一種利用城市空間創造新紀律與社會秩序，將政府與民眾納入一體的企圖。政府職能部門的主要建築在南京十年期間建成，強化了政府調動國家與社會資源的能力，加強了其集權傾向。

寢與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相關聯（頁128）。

國民黨將孫中山生前內涵豐富的思想理念簡化為以科學性、實效性以及為民族奉獻的神聖性為主要內容的意識形態（頁126）。政府所在地位於中山陵的山腳下，在國父與他所創建的政黨之間建立起一種精神紐帶。首都規劃重點在於塑造一種民族的、政治的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認同和一致性（頁95-96）。中央政治區毗鄰中山陵，極大地加強了國民黨樹立的黨國體制的合法性。

在作者看來，1930年代南京的「建築革命」體現出一種利用城市空間創造新紀律與社會秩序，將政府與民眾納入一體的企圖（頁117）。政府職能部門的主要建築在南京十年期間建成，並被視作現代化的體現，服務於國民政府的經濟和戰略規劃（頁120）。這些機構相繼投入運作，強化了國民政府調動國家與社會資源的能力，加強了其集權傾向，顯示出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政府所具有的管理國家及市民的能力和理念（頁19）。

然而，民國時期南京的「建築革命」以及政府的集權傾向具有致命的弱點。規劃者倚仗專業知識，認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領導者，比民眾更清楚知道他們需要甚麼（頁87）。南京老城區的街道十分狹窄，為了拓寬馬路以及修建城區主幹道中山路，需要拆遷大量居民房屋。政府和規劃者合謀的結果是忽視了民眾自身的利益。政府承諾在人民服從城市規劃的前提下，他們將得到繁榮、現代生活以及受益於

國力的強大。然而當地居民不滿政府的拆遷補償方案，認為私有財產受到侵犯，並作出集體抵制（頁79、82）。南京的規劃者掀起的「建築革命」旨在以超越的速度進行城市現代化轉型，他們無法等待一個中產階層自然發育成熟，而是通過規劃城市空間創造了一個想像的中產階層；他們也無法等待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而是宣稱新型城市空間會帶來理想的現代生活（頁87）。

面對民眾的抗議和抵制，政府與規劃者站在同一陣線，認為民眾目光短淺，受一己私利驅使；劉紀文更宣稱決不向民眾的抵制低頭。此外，民國時期的法律並未規定城市治理的權責邊界，從而導致南京的市政管理歸於內政部，而非南京市政府。因此，儘管南京十年期間政府高度集權，但權力的運行過程並不穩定，總共換了六任南京市長，頻繁的人事變動也影響到行政治理的效率和穩定性（頁62-63）。

### 三 曆法與節日慶典

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執政者往往通過時間規則的建構與控制來規訓民眾，為其統治尋求合法性。如本書所述，為了廢除封建帝制的時代象徵，與世界文明接軌，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時提出改用國際通行的陽曆紀年法，採取民國紀元。1928年，國民政府宣布統一實行孫中山倡導的紀年法，所有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及學校等都必須遵守。陰曆紀年法適用於農業社會，

而陽曆紀年法則適用於城市。政府禁止人民遵從傳統陰曆新年的習俗，制訂了「雙十節」等一系列法定假日，以及與孫中山革命生涯的關鍵時刻有關的黨國紀念日，希望藉着新的節日和曆法制度能夠教育人民遵守新的國際時間標準，從而規範工作、娛樂、商業及財政計劃。然而，新的紀年法對於傳統農村生活習俗是一種威脅。民眾不願意放棄傳統陰曆節日和習俗，他們對官方宣傳的黨國紀念日的重大意義極度反感（頁 169-74）。

1928年清黨之後，國民黨由一個有着廣泛群眾參與的動員型革命黨蛻變為一個以政治控制為主的執政黨<sup>⑦</sup>。作者指出，國民黨政權為了消解民眾對官方規定的節日和曆法的冷漠和抵制，在容忍民眾保有傳統節日習俗的同時，在城市開展了大量節日慶典儀式的活動，動員民眾參與。閱兵式成為國慶日慶典的主要內容之一，各種標語、口號、演講等層出不窮。明孝陵與中山紀念公園是兩個大型群眾集會場所，南京市民被鼓勵到那裏表達他們對國父的崇敬（頁 190）。國民黨在各個縣、市的基層黨務人員對地方經濟社會政策影響不大，但他們熱衷於主導國民黨的各種慶典儀式活動（頁 195）。政府認為民眾的素質尚不足以實行民主和憲政，因此動員他們參與黨國的節日慶典，喚醒他們的民族與國家認同。而民眾的參與並不意味着他們認同政府的執政主張，許多人懷着獵奇、湊熱鬧等各種心態與目的參加活動（頁 202）。這些慶典活動逐漸流於不易

管控的喧鬧和狂歡，對城市社會秩序構成挑戰。

1929年，國民政府精心籌辦了規模宏大的孫中山靈柩安葬典禮。這是一場由國家與民間共同操演完成、影響波及各地的全國性紀念儀式，也是國民黨向民眾自上而下灌輸領袖崇拜、宣傳國家意識形態的絕好機會。為迎接孫中山在北京碧雲寺的靈柩，國民黨中央事先布置一輛宣傳列車，從5月初至5月底，沿津浦線北上展開宣傳；沿途經停浦口、蚌埠等七個大站以及三十個中小站點。每到一站，即會同當地黨部召集各機關、民眾團體、學校代表，召開迎襯紀念宣傳大會。宣傳過程中採用了各種形式，包括集會講演、散發宣傳品，放映和演出有關孫中山革命事迹的電影、話劇、魔術，用留聲機播放孫中山的演說唱片，張貼各種迎襯圖畫和標語等<sup>⑧</sup>，這些宣傳活動使民眾對孫中山的記憶更加形象和具體。6月1日，國民政府舉行了禮節繁雜、控制嚴格、場面宏大的祭祀活動。所有的參加者都被要求靜默和有序，他們對總理的緬懷不能夠轉化為對當前執政者的不滿（頁 150）。整場典禮被錄影，在公共場合反覆播放。未能親歷大典的民眾可以通過各類傳媒的傳播和報導，感受到大典的隆重與悲壯。全國性奉安大典儀式展示了國民黨領導的新生國家政權已經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國家意識形態得到有效宣傳，孫中山符號得以建構，而國家權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體現了神聖化<sup>⑨</sup>。

國民黨政權為了消解民眾對官方規定的節日和曆法的冷漠和抵制，在城市開展了大量節日慶典儀式的活動。民眾的參與並不意味着他們認同政府的執政主張，許多人懷着獵奇、湊熱鬧等各種心態與目的參加活動。

南京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經常與統治者刻意打造的秩序、紀律、意識形態和強力統治相抵觸，遂利用標誌着新意義的建築空間表達自身的訴求並採取行動，創造了集體記憶。南京十年期間持續不斷的城市抗爭，說明國民黨政權在民眾心中缺乏合法性。

不過，國民黨舉行的祭奠活動也不乏異議。有反對者認為活動過於鋪張浪費，指出這些巨大的花費應當用於解決中國繼續發展所面對的一些主要問題。然而，大多數新聞輿論及觀察者仍然被紀念活動本身所打動。祭祀孫中山的活動也贏得了西方列強的認同，提高了國民政府的國際聲譽。許多外國駐華大使、參贊等人員都參加了祭祀活動，並予以高度評價。南京成為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走向國際舞台的展示視窗（頁164-65）。由此可見，政府制訂節假日的計劃及慶典儀式，將一個原先只有區域影響力的政黨成功塑造成一個在觀念上引領國家走向現代化道路的全國性政黨（頁201）。

在孫中山的遺體安葬中山陵後，國民黨開始制訂嚴格的謁陵規範，希望使全體國民崇拜孫中山，服從黨國統治。每逢重大節日、日常集會、文官考試等，國民黨及社會各界均舉行謁陵儀式，主要的國

家節日活動都會在清早以謁陵展開序幕（頁176）。中山陵對於國民黨官員而言意味着一個神聖的儀式場所。由於孫中山符號是重要的象徵資本，國民黨政要常常在孫中山靈前上演權力鬥爭的政治鬧劇。國民黨標榜遵從總理遺教，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準則，但由於政治腐敗，民生凋敝，謁陵遂成為人們表達對國民黨不滿的實踐形式<sup>⑩</sup>。中山陵成了一個象徵的政治意識空間，那裏的抗爭意味着陵墓具有強大的象徵權力，是國家不能夠壟斷的（頁204）。

#### 四 民眾的回應

國民黨希望用莊嚴的大道、新式體育館、公園等公共建築作為構建民族與國家認同、塑造新市民的城市空間。然而，南京的城市居民對此有着自己的解讀和利用方式。他們的日常生活經常與統治者刻意



在孫中山的遺體安葬中山陵後，國民黨開始制訂嚴格的謁陵規範，希望使全體國民崇拜孫中山，服從黨國統治。（資料圖片）

打造的秩序、紀律、意識形態和強力統治相抵觸，遂利用這些標誌着新意義的建築空間表達自身的訴求並採取行動，創造了集體記憶。這些建築空間也獲得了更廣闊的合法性，不再局限於官方所賦予的意義。在作者看來，當市民從消極抵抗到積極抗議的時候，街道成為國家與社會發生碰撞與融合的交叉點。南京十年期間持續不斷的城市抗爭，說明國民黨政權在民眾心中缺乏合法性（頁204-205）。儘管在此期間南京的城市交通狀況有了極大改善，新街口等地成為城市的重要交通樞紐，但新聞輿論始終聚焦於各種道路上頻發的危險狀況。本地的新聞報紙經常報導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把汽車視為危險的「城市老虎」。新修的人行道的使用也不符合規劃者的初衷，人們習慣於在人行道上從事各種活動，如婦女在人行道上哺乳、攤販任意佔道擺攤（頁210）；交通設施的發展也無法滿足南京迅速增長的人口需求。儘管南京十年期間城市公共建設得到明顯改善，但市民並未享受到它所帶來的益處，許多公共建築和設施集中於政府辦公區以及外國領事館等地；資金短缺與人口劇增成為影響城市建設的兩大因素。此外，儘管政府實施了拆除和改善城市平民住房的工程，但無法真正改變那些舊城區市民的生活習慣（頁215）。對一些老市民而言，他們不願意生活被改變。

國民黨認為城市需要強有力的統治秩序。南京十年期間，警政事業迅速發展，遍布全城，建立了六十四個警察局；國民黨軍事機構也大量駐扎在此。儘管外在的統治

力量不斷加強，但南京市民仍然借助城市空間積極從事各種抵制與請願活動（頁217）。南京的許多抗議活動往往起源於中央大學，這裏的大學生經常聯合其他中等學校及大專的學生組織各種校園集會。初期的抗議活動主要包括市民的利益訴求以及學生對國民黨消極抗日方針的抵制，然而一旦學生積極投身抗議活動，他們就不願再埋頭於校園的書本學習之中（頁221）。

國民政府通常採取溫和態度對待學生的請願，學生代表往往受到政府的热情招待，能夠得到高層領袖的接見，並獲得領袖秘密承諾的對抗日本的「解決方案」（頁223）。然而，一些學生因採取過激方式抵制國民政府而被逮捕；當學生的行動過於激進時，往往失去普通民眾的支持。儘管民眾同樣反對日本的侵略，但他們更關注房屋拆遷等涉及自身利益的具體問題，對反政府的抗議活動缺乏興趣（頁226）；社會輿論也認為學生走得太遠。後期的學生運動從中得到教訓，學生開始理性地將行動限制在合理的範圍內。1936年的「雙十節」，南京舉行了宏大的慶典活動。「西安事變」後，南京全城民眾遊行，慶賀國家領袖的平安歸來。南京十年的末期，蔣介石利用對日抗戰的契機，逐漸將整個民族整合在一起，使國民黨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頁242）。

## 五 結論與思考

作者認為，南京十年期間，儘管政府與規劃者制訂的各種政策措

儘管政府與規劃者制訂的各種政策措施時常遭遇民眾的抵制，但這個城市開始建構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需的民族精神象徵，政府也由此獲得了執政的合法性資源。但是，南京從來沒有被視為一個永久性首都。



國共兩黨的領導者都是同一代人，汲取了現代中國革命進程中相同的政治實踐和帝制時代的文化遺產。中山陵與天安門廣場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都成為不同政見者以及對政府心懷不滿者的聚集地。

施時常遭遇民眾的抵制，但這個城市開始建構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需的民族精神象徵，政府也由此獲得了執政的合法性資源（頁245）。

作者從三個方面作出結論：

首先，相較於北京而言，南京從來沒有被視為一個永久性首都。清末民初，政治時局的變動並未影響北京作為首都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相反，南京一開始只是國民黨作為一個派系勢力掌控的城市。儘管南京成為中華民國的首都，但國民黨政權一直飽受政局分裂、軍閥割據的困擾，因而影響其管治合法性和有效性。在此期間，不僅謠傳政府要遷都上海，加上淞滬戰爭期間日艦進犯長江流域，威脅南京，政府一度遷都洛陽，由此引發了關於南京是否適合做首都的爭論。此外，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也削弱了南京作為首都的功能。對一些人來說，南京只是蔣介石的城市，而不是一個國家的永久性首都。由於南京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緊密關聯，1949年後，北京取代南京，成為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首都（頁247-51）。

其次，南京十年時期，執政者與規劃者希望將南京打造成為模範首都，成為塑造中華民國政治統一體的精神核心（頁252）。期間，政府與民眾在城市公共空間內展開博弈，其背後是推進現代民族國家政權與維繫傳統鄉土社會生活習俗之間的衝突。國民政府一方面通過提倡傳統禮儀文化，另一方面通過抬高孫中山的精神領袖地位，默許民眾保有原來的生活習俗，同時動員民眾參與各種節日慶典，推進政權合法性，喚醒民眾的民族與國家認

同。儘管中日戰爭危機強化了國民黨政權在形式上的統一，但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失利使其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喪失殆盡，為共產黨的崛起和國家再造鋪平了道路（頁259）。

再者，作者將南京、北京與台北作比較，考察民國時期的首都遺產。1949年後，共產黨政權沿用了南京時期的首都美學與國家儀式（頁262）。1950年代，蘇聯專家與中國專家就北京城的規劃方案出現了意見分歧。前者主張沿用帝制時代的建築，將紫禁城作為新政權的中心區；後者則認為應當保護老城，另建新城。毛澤東採納了蘇聯專家的意見。國共兩黨的領導者都是同一代人，汲取了現代中國革命進程中相同的政治實踐和帝制時代的文化遺產。中山陵與天安門廣場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都成為不同政見者以及對政府心懷不滿者的聚集地。至於作為國民黨退居台灣的首都台北，儘管在城市空間方面同樣複製了民國時期南京規劃格局中的中央行政區，但開闢了儀式化紀念空間的新方向。國民黨到台灣初期，總統府與介壽路（今稱凱達格蘭大道）成為各種抗議者抵制政府的聚集地。伴隨台灣的民主化發展，民主自由的理念也在改變着人們對城市空間的解讀和利用：規劃者可以製造空間，政黨可以舉行儀式，城市空間成為政府與社會力量共同介入並賦予意義的場所（頁263-65）。儘管今天的北京和台北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面向，但1949年後的共產黨與國民黨都繼承了民國時期首都南京的建築遺產。

筆者認為，與西方中世紀以來以集市貿易為基礎興起的城市不同，中國歷史上城市的形態與功能深受政治與軍事方面的影響，經濟層面的作用居於次要地位。而作為民國首都的南京，其近代以來的城市歷史文脈注定與國民黨政權對現代中國的設計和改造密不可分。如何把握民國時期南京的「地方性」與「國家性」之間的黏合與張力，是體現研究者功力的關鍵。國民黨創立伊始，即是一個以粵籍為主的派系色彩濃厚的政黨。寧粵對峙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江浙派戰勝了黨內的廣東派，蔣介石「最高領袖」的地位得以確立<sup>①</sup>。自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執政起，即面臨整合社會、重建國家的歷史任務。此後國民黨如何淡化地方色彩，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已有研究尚缺乏足夠關注。本書通過民國時期南京的城市規劃與建築空間的文化意義，力圖呈現國民黨在南京十年期間擺脫了「地方性」，獲得政權合法性的過程，將「地方性」放置在「國家性」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推進了該問題的研究。作者進而認為，國民黨在獲得政權合法性的過程中伴隨着不斷的集權化、儀式化、妥協與競爭。然而作者僅描述了國民黨建構政權合法性過程中的策略和表現方式，並未分析國民黨建構政權合法性本身失敗的原因。海內外學者在關於民國時期的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其政權具有派系性、妥協性、脆弱性等特點的問題上已基本達成共識，在這前提下，作者的結論大體不差，但難免有隔靴搔癢，意猶未盡之憾。

此外，單從國民黨政權核心所在地的建築文化及政治儀式的角度考察國民黨政權獲得合法性過程的論證框架值得商榷。在趙鼎新看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有三個要素：意識形態、執政績效與政治選舉（程序合法性）<sup>②</sup>。與擅長理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的共產黨相比，國民黨在此方面的能力較為薄弱。與共產黨不同，國民黨並未許諾一個無限光明的烏托邦社會的到來。19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證明國民黨對民眾的意識形態灌輸並不成功。南京十年期間的政治與社會穩定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繁榮，可以視作國民政府獲得的良好執政績效。儘管蔣介石接替孫中山成為國民黨領袖，但在此過程中一直伴隨黨內派系的反對以及黨外軍閥的倒戈，這為蔣介石名義上統一全國、結束軍閥割據局面，實則以相互認可各自勢力範圍的方式擺平各種軍政勢力埋下伏筆，客觀上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妥協性和不穩定性。因此，在考察國民黨政權獲得合法性過程時，或許應該重點關注趙鼎新所提出的後兩個層面。

將民國時期的南京與上海相比，可以看到兩個城市在超越地方性、構建公共性方面的路徑差異。小濱正子指出，清末上海的社團發揮了慈善、救濟等地域社會的公共職能，民國初年的地方自治與中央政權的弱勢強化了上海社團發揮的地方公益作用，以資本家為核心的地方精英在其中處於領導地位。1927年後，國民政府試圖融合「黨治」與「地方公益」，重建地方精英所主導的公共性，使民間社團接受

國民黨在獲得政權合法性的過程中伴隨着不斷的集權化、儀式化、妥協與競爭。然而作者僅描述了國民黨建構政權合法性過程中的策略和表現方式，並未分析國民黨建構政權合法性本身失敗的原因。

國民政府在南京構建的並非現代城市公民所應具有的公共性意識，而只是國民黨一廂情願構造的國家意識。由此引申的問題是，對於首都城市而言，其作為首都的政治特性是否壓抑了城市本身的特性？

國民政府的領導和監督<sup>⑬</sup>。由此可見，近代上海的公共性是在地方精英的主導下自發生成，從而體現出上海的城市特性。而南京一方面由於缺乏像上海一樣發達的社團組織和地方精英，另一方面緣於其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首都定位，故南京的公共性無法由市民與地方精英孕育產生，只能由國民黨自上而下地單方面建構。在作者看來，政府與技術專家儘管有意使南京城市及市民轉向現代化，但這一微弱的願望被遮蔽在國民黨構建黨國統治合法性的努力下。國民政府在南京構建的並非現代城市公民所應具有的公共性意識，而只是國民黨一廂情願構造的國家意識。由此引申的問題是，對於首都城市而言，其作為首都的政治特性是否壓抑了城市本身的特性？換句話說，這些城市的特性是否就是「首都特性」？如果是，如何解釋北京、南京、洛陽、開封等中國歷史上的首都城市的內在差異？如果不是，又如何發掘首都城市自身的特性及其與「首都特性」之間的張力體現？

《競爭的中國首都》論證的核心問題可以上升為現代民族國家所普遍遇到的國家政權建設問題。現代國家政權建設是一個權力結構從分散到集中的演進過程，其間，公民的政治認同從傳統的地方性組織上升到國家政體，其本身的公民權利得到釋放，並由國家承擔起保障這些新權利的責任。與此同時，傳統地方精英的庇護結構解體，國家權威提高，新的權威和社會關係得以確立<sup>⑭</sup>。近代中國與西方的國家

政權建設過程截然不同。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國王通過為普通民眾提供保護，挑戰了地方精英的力量，取得普遍支持，民眾則獲得了公民身份<sup>⑮</sup>。它們不停地建立共同利益和想法，消除特殊性和地方性，聯合起來提高生活和才智，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創建國家和政府<sup>⑯</sup>。

然而，無論是董玥筆下的北京，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筆下的華北農村，王笛筆下的成都，抑或本書作者筆下的南京，都展示出民國時期的現代化轉型中，傳統士紳階層庇護地方社會的功能不斷衰減，權力向下延伸的政府與地方精英及技術專家合謀，侵害甚至吞噬了民眾利益<sup>⑰</sup>。由此引發的問題是，這種在民眾看來幾近掠奪的行為，其政府如何獲得普遍認同，建構政權合法性？而上述研究均表明，民眾並非任由政權拿捏和形塑的工具，他們的行動自有其主體性；民眾內部也非鐵板一塊。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新舊社會群體與階層交錯混雜，他們的利益訴求與行動方式如何體現出時代共性與內部差異性？此外，國共兩黨都強調對地方的控制和對國家資源的動員，但是共產黨信仰階級鬥爭，國民黨相信全民革命；共產黨挑戰以歐美列強為主的世界秩序，國民黨尊重以歐美為主的世界秩序。兩者所採取的對策截然不同，所獲得的效果也有天淵之別<sup>⑱</sup>。對比1949年的前與後，國共兩黨政權合法性的建構過程及民眾的回應，也是一個有待深入的后續議題。

## 註釋

① 侯鳳雲：《傳統、機遇與變遷——南京城市現代化研究（1927-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97。

② 相關研究主要參見Maryruth Coleman, *Municipal Politics in Nationalist China: Nanjing, 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Zvia Lipkin, *Useless to the Stat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ist Nanjing, 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rk S. Eykholt,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8); 李忠恭：《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董佳：《民國首都南京的營造政治與現代想像（192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③ 陳蘊茜：〈空間維度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學術月刊》，2009年第10期，頁142。

④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9-10。

⑤ 董佳：〈締造新都：民國首都南京的城市設計與規劃政治——以1928-1929年的首都規劃為中心〉，《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頁142。

⑥ 傅崇蘭等：《中國城市發展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173。

⑦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93。

⑧ 李忠恭：〈「黨葬」孫中山：現代中國的儀式與政治〉，《清華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頁65。

⑨ 陳蘊茜：〈國家典禮、民間儀式與社會記憶——全國奉安紀念

與孫中山符號的建構〉，《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8期，頁88。

⑩ 陳蘊茜：〈謁陵儀式與民國政治文化〉，《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頁23。

⑪ 關於地域觀念與國民黨黨內派系鬥爭的關係，參見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⑫ 趙鼎新：〈當今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2年12月號，頁7。

⑬ 小濱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288。

⑭ 張靜：〈國家政權建設：問題與回顧〉，載《社會衝突的結構性來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50。

⑮ Charles Tilly, introduc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24.

⑯ 基佐 (François M. Guizot) 著，程洪達、沅芷譯：《歐洲文明史：自羅馬帝國敗落到法國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198。

⑰ 參見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王笛著，李德英、謝繼華、鄧麗譯：《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⑱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4。